

女性作家的书写

——叶广岑与张爱玲家族小说比较研究

代娜新^①

(辽东学院 国际交流中心, 辽宁 丹东 118003)

摘要: 叶广岑和张爱玲两位作家都善于从女性的角度观察社会, 体味人生。在她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的都带有自身及自己家族的影子, 以女性作家的视角关注历史和文化, 女性性别的独特性, 致使她们更多的关注女性的生活体验以及情感经验, 注重在作品中传达女性的精神需求, 并有其区别于男性文化语言的独特性, 渗透出鲜明的女性色彩。

关键词: 女性; 家族小说; 叶广岑; 张爱玲;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5)04-0116-06

一、引言

叶广岑和张爱玲的性别决定了她们用女性作家的角度去关注问题, 即广义上的“女性意识”。法国的埃莱娜·西苏说过: “我是女人, 我与起源, 与亲近关系发自内心地息息相关, 我是母亲, 是女儿, 我无法不让自己做一名女人”^[1]。男女两性之间除了显著的生理区别之外, 心理活动, 特别是情感体验是迥然不同的。女性性别的独特性, 致使女性作家更多地关注女性的生活体验以及情感经验, 注重在作品中传达女性的精神需求。这种对女性个体关注的视角具体落实到不同的女性作家身上, 生活经历的不同, 其关注点也会相应的产生变化, 并在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女性色彩。

二、女性作家视角

叶广岑和张爱玲特殊的出身使二人的小说创作中都散发出或浓或浅的贵族生活气息。但是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大不相同, 致使二人的性格、生活观、价值观等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也鲜明地表现在二人的家族小说创作中。叶广岑的身世经历使她的家族小说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作品风格则是凄美柔婉中略带京味儿小说的诙谐调侃。

张爱玲的家族小说则着重描写的时代变迁中人们被金钱、权势等各种原因压抑的生活状态, 她充满才情的贵族小姐的文字可以说是末代贵族苍凉的投影。通过两位女性作家的家族小说的比较研究, 可以更加深入地展现女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现状的不同思考。

(一) 家族小说中的女性权力

叶广岑的小说往往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 她对女性性别文化十分看重。叶广岑用自己的笔, 记录了满族女性曾经遭受的深重苦难, 替那些女性言说了无法言说的痛苦。在她创作的历史小说中, 非常注重反抗男性强权和维护女性权利, 例如《采桑子》《大登殿》等。而张爱玲的作品更是具有鲜明女性意识, 她通常描绘的都是女性在父权家族制度压迫下的绝望生活, 例如《金锁记》《沉香屑》等。那些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最后都绝望的发现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妄想, 女性往往在生活的苦难中获得精神上的成长, 但是对未来依旧是弱者姿态。张爱玲的小说中更多的表现出女性生活的无望与孤寂。女性作家观察角度的差别, 使二人创作出来的家族小说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① 收稿日期: 2015-01-10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W2015159)

作者简介: 代娜新(1968—), 女(蒙古族),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瓦解男性话语权，张扬女性性别意识，似乎是叶广岑和张爱玲共同着手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基于女性角度上的差异，叶广岑与张爱玲对性别意识的建构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叶广岑往往通过塑造理想中的女性形象，通过她们的抗争，剥夺男性的话语权，从而彰显女性独立意识，达到重新建构性别意识的目的。她在作品中往往采用复线结构，同时塑造两位女性形象进行对比，表现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对自己权利的捍卫。以《大登殿》为例，叶广岑便是以两个视角的转换，表现两代女性对情感和爱情的不同理解，以及她们对自我的不同定位。作品中有两个“我”，一个“我”以“母亲”的身份解释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幸福；一个“我”则以现代的眼光看待爱情。“母亲”这种权利的捍卫过程往往伴随着男性权利的消减。在男权主义盛行的民国初年，普通女性想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在社会上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家境贫寒的“母亲”来说，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是不可能。“母亲”之所以能够勇敢的捍卫自己的女性权利，是因为她身体内的女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母亲”通过一切手段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并最终获得成功。与“母亲”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傍大款”的重孙女博美，博美的行为与“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男性所轻视。叶广岑通过两个女性的对比，塑造了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同时表达了对女性应有权利的肯定，并揭示了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而达到重建性别意识的目的。而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强烈的性别意识。她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女性自我欲望的书写，显示出女性渴望从父权制度中解脱出来，但在苦苦挣扎后却无法解脱的悲剧历程。在叙事过程中，张爱玲往往有意识的脱离男性中心叙事，以女人的眼光重新观看历史，从女人的角度审视历史长河中女人和男人的生存状态，书写女人眼中人类生存的另一种“真实”状态。在过去的传统文学的叙事中，往往将女性的堕落和不幸都归结到外界社会的压迫，而男性通常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被倾轧、欺凌的女性面前，女性作为不幸的被动承受者是典型的传统男性叙事模式。张爱玲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叙事模

式，在她的笔下，女性的堕落是自我的选择，她们往往是自愿沉浸在一个黑暗沉寂的世界里，不能反抗也不愿反抗，如同“绣在屏风上的鸟”一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性格十分极端的人物。她出身麻油店，身份卑微，且缺乏教养，机缘巧合嫁入大宅院，欲望的不断滋生和现实处境的困窘，致使她的心理逐渐扭曲，一步步走向疯狂的深渊。表面上，曹七巧在嫁入大宅院后，当上了让外人艳羡的太太，吃喝不用操心，但是这一切都以常年守着瘫痪在床的如同废人一般的丈夫为代价。她的一生都处在双重心理矛盾的压抑中。一方面，她因为丈夫的瘫痪，情欲得不到宣泄，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致使心灵扭曲；另一方面，面对自己以青春换来的金钱，她除了奋力保护外，对金钱的欲望也始终得不到满足。她将这种心理压迫感转为对儿子和女儿人生的破坏，试图拉着自己所有的亲人一同步入地狱。曹七巧的这种疯狂的报复心态，可以说是自身欲望被压抑后不受心理控制的表现，但是曹七巧是自己走入了这个牢笼中，并且她一生都没有想过要走出这个牢笼。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张爱玲对旧社会中女性被压迫困境的颠覆性描绘，同时也体现了她建构性别意识的独特手法。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

叶广岑和张爱玲都擅长塑造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叶广岑创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包括：受尽欺凌、饱尝艰辛、一生都很悲惨的女子——《雾》中的张高氏；独霸专权的封建大家长——《瘦尽灯花又一宵》中的舅太太；受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底层劳动女子——《豆汁记》中的莫姜；文化水平不高，但敢于捍卫自己女性权力的女子——《大登殿》中的“母亲”。叶广岑擅长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人性的发展变化，表现女子的命运转折。

张爱玲也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例如被金钱锁住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善良但却命途坎坷的《半生缘》中的曼桢；天真无邪的妙龄少女《茉莉香片》中的丹朱等。张爱玲创作的女性形象之所以形象生动，是因为她善于撕去笼罩在生活表面的温情面

纱,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表现旧时代女子卑微的生活状态,并将她们沉默、封闭、依附、以及内心深处的欲望等深层心理特征表现出来,体现了父权社会女性被扭曲、被欺凌的真实生活状态,将历史掩藏的女性真实生活状态展现了出来。

叶广芩擅长女性形象的刻画,特别注重对女性进行心理的开掘和展示。在小说《采桑子》中,她刻画了多位性格迥异的格格形象。大格格金舜锦,因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决定脱离现实生活,沉醉在戏文的世界里,最终凄惨地死去;二格格金舜镞拥有美丽的外貌,因为自由恋爱,找了个商人,破了家族的规矩,被赶出家门,一直到临死前也没有获得家人的谅解;三格格金舜钰心怀爱国之志,勇敢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但是却被加入国民党的亲哥哥残忍地秘密杀害;四格格金舜鐔勤奋好学,长大后成为了一位古建筑专家,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保护和修复古建筑的事业中。叶广芩在《采桑子》中塑造的或柔弱、或坚强、或睿智、或多情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她潜意识中张扬女性意识的渴望。在《采桑子》中格格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她们执着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愿做男人的依附品,追求自我人格的独立。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叶广芩往往有意识将其作为女性的陪衬,如小说中长子金舜铎的形象,他的薄情寡义对传统社会中男性的理想形象有所颠覆,从而衬托出女性的纯洁与美好。

张爱玲更擅长对女性进行心理纵向的开掘和展示。《金锁记》讲述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故事,悬挂于夜空的月亮见证了曹七巧在这三十年里的跌宕人生。但整部《金锁记》并没有详细描述故事的发展背景,而是着重展现曹七巧在这三十年中性格如何被一步步异化。从前十年曹七巧如何在金钱和情欲中挣扎到后十年死守财产,折磨自己的儿女,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中一步步走向灵魂的地狱。人性的脆弱与复杂,以及女性的悲哀与疯狂,被张爱玲演绎得淋漓尽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2]。虽然曹七巧已经死了,但这并不代表人生故事的结束,扭曲曹七巧人性,并使她异化的力量仍旧存在,苍凉并让人绝望。人性沦

丧的幻灭感由此可见一斑,也更加显现了张爱玲对人性深度开掘。

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是有“性别”的。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被迫游离于历史的边缘。而女性作家的出现,使女性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为女性作家,叶广芩和张爱玲的女性视角的差异,与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叶广芩则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期,时代的变幻以及政治的风云突变对叶广芩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她格外重视表现女性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中命运的变化,虽然在女性心理的深度挖掘中,叶广芩稍逊于张爱玲,但是她更善于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探究女性其心理的变化轨迹。张爱玲的创作活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沦陷了的上海,人们从醉生梦死的“孤岛”生活中坠入幻灭的世界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张爱玲着重表现人们对人生、社会、乃至世界的绝望感和幻灭感,即人生的苍凉。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忽视对历史的背景以及时代变迁的叙述,而是着重表现对人生的追问。

三、历史、文化角度

自古以来,女性就一直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而随着社会的更替,人们思想的解放,很多作家开始关注女性意识,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体验更加深刻,她们不断探寻女性处于弱势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作家的文学灵感来源于自身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并且长期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样出身贵族,但由于张爱玲与叶广芩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的不同,这就使得二人关注历史与文化的聚焦点有所不同。

(一) 以女性意识看贵族文化

纵观悠悠历史,满族文化为满族的长期统治提供了无形的助力。满族统治者一度致力于满汉一家,立志于将汉文化的精髓引入满族文化之中。这种结合了汉族文化特色的满族文化为自己构建了强势而全面的姿态。但是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满族文化也面临着没落的危险。而叶广芩与张爱玲就生活在这一贵族文化没落的时期,她们分别从自身经历出发,以女性作家的视角描写贵族文化。

叶广岑显赫的家世给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同时也根深蒂固地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尽管她也曾出国接受国外的文化教育，但是离家时她已将近中年，错过了最佳的学习与教育年龄。而满族文化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并一直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叶广岑的家族小说中的女子形象大多是有独立、能够当家作主、勇敢豪迈的旗人女子。满族人未出嫁的姑娘称为“姑奶奶”，称姑妈为“老姑奶奶”。满族姑奶奶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父母、兄弟都十分尊重，即使嫁了人，回到娘家也受到敬重，这一点与汉族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对满族大环境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叶广岑不仅批判了当时没落的贵族文化对女性的迫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贵族文化失落的痛惜。在《逍遥津》中，满族女子大秀是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大秀对内要照顾一家老小，对外要处理各种事务。在家族没落的时候，她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弟弟和父亲去世以后，一个人坚强地生活到96岁。

张爱玲虽然也出身贵族，但是她幼年时所经历的家庭变故，使她过早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奈与痛苦。父亲给予她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熏陶，母亲给予了她接触西方教育的机会，都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张爱玲漠视宏观政事，而倾心于对乱世中的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并以此展现没落贵族文化的腐朽。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是没落封建大家族的贵族，受制于封建礼教与传统文化，对命运逆来顺受，无法自我解放。《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象一个小户人家的家庭主妇，已经完全没有了早年的阔少奶奶的气派，即使在全少爷的眼中：“现在是不行了，看她在那洗碗，脸就跟墙一个颜色，手里那块抹布也是那个颜色。”^[3]遗老遗少们只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根本没有对家庭的责任。

（二）以女性意识看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它所倡导的高尚人格是人们终身追求的目标，并将“三纲五常”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儒家文化纵跨中国历史几千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自尊与独立，培育了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炎黄子孙逐渐形成了高尚的节操与富有魅力

的人格，儒家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责任，对国家民族和家庭的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对儒家文化作了最好的阐释。对普通人来讲，儒家文化是以家庭为本的文化，它关注个人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也关注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与束缚。尽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儒家文化对于文学创作者的影响仍然很大。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高尚品格也成为文学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

叶广岑与其家族成员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陶冶，醉心于书法、绘画、经典文学的学习，在叶广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儒家文化的种子，以至于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向着儒家文化靠拢。《采桑子》以“我”——金家小格格的眼光看待金家的每一个成员。在她看来，七哥舜铨就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只用一个‘儒’字便可以概括，对父母、对兄弟、对恋人、对朋友，一概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的是中庸之道，做的是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4]对于舜铨来说，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他都会无条件地执行，因此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并且与自己各个方面相差悬殊的妻子丽英。只要是父亲的决定，他都不会反驳，即使是失去尊严与生命，他都要尽全力去做。小格格赞赏他对父母的孝顺最恰当地展示了儒家思想当中的“孝悌”，但却也无法理解七哥的愚孝。

在张爱玲大部分的家族小说中，都涉及了婚姻以及男女情爱。从复杂的男女关系当中，张爱玲看到了最为普通、也极易被忽略的生理需求与生存需要。在张爱玲的家族小说中，几乎不存在纯粹美好的爱情。女性的婚姻仅仅是为了找寻生存的机会，她把这些女性称之为“女结婚员”。在这种无奈而痛苦的婚姻中，男女地位出现极度的不平等。家庭对于女人来说只能是牢笼，而非温暖的港湾。以《倾城之恋》为例，白流苏离婚后，从夫家带了点钱回到了娘家，娘家的哥嫂本不愿意，但看在钱的份上，收留了她，谁知好景不长，这些钱很快就被他们花的精光，白流苏受到了来自家人的冷嘲热讽，连母亲也希望她回到夫家守孝，领养个孩子过下半生。这时她认识了本来是给妹妹介绍的范柳

原,两个情场高手在香港周旋了一个多月,港战爆发了,男人的责任感促使范柳原折回香港保护白流苏,成就了倾城之恋。小说精彩演绎了一段在男权社会,白家小姐白流苏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家,“用尽各种手段,其间的煎熬与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5]

(三) 以女性意识看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伴随着历史而产生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方面的民间文化。这种文化有着很强的集体性、一致性与区域性。在叶广芩与张爱玲的生活中,均有着独特的民俗事象,表现在各自的家族小说中也有所不同。

在叶广芩的家庭小说中,比较突出的是北京民间戏曲文化。这种民俗文化给人以浓郁的京味儿,所以常被人称作“京味小说”。《采桑子》中的金家是王府贵族,更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流行的戏曲。贵族们大都痴迷于京戏,还专门雇养着私家戏班,并为戏班提供所用的各种道具,甚至其中重要人物的住处都是在“戏楼胡同”。《采桑子》用朴实的文字勾勒出人们对于京戏的热爱与痴迷。金家的大格格整天痴迷于京剧中不能自拔,真正的是达到了“人生如戏”,物我两忘的境界了,最后也死在了戏上。除此之外,贵族后裔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中相当一部分使用的是京剧的剧目,如《玉堂春》《三击掌》和《小放牛》等,京戏中的故事和小说中的故事在情节上,甚至是故事的结局都是暗合的,更好地表达了人物的情感,表现出叶广芩作为一个贵族后裔的文化遗产的魅力。

婚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叶广芩也对于婚俗文化也有着适当的描述,一方面表现在儿女的婚事上,《采桑子》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男女成亲的惯例,也是金家女子惨痛婚姻的根源。大格格缺乏追求幸福的勇气,而将自己推向传统婚姻的陷阱,断送了人生。五格格嫁给了门当户对的满族贵族后裔完占泰,但却因为志不同道不合,最终从传统婚姻中挣扎而出,历尽辛苦,终于找到与自己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婚俗上,一般新娘在出嫁前要“开脸”,就是在蒙上盖头之前,由专门负责绞脸的人用丝线,

把脸上的绒毛绞掉,表示从今天开始就由女孩子变为女人了,不是黄毛丫头了。上轿之前,手里要捧着个瓷瓶,里面要装上各种粮食,表示富足康健;等新娘的过程中,吹鼓手一直在吹,就是给新娘上轿之前的活动让出时间,新娘家按时间的长短给赏钱,如果新娘准备好了,该上花轿了,吹鼓手就吹起了《百鸟朝凤》,意思是该出发了。

另外,饮食起居文化在叶广芩家族小说中也有描述。“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个传统的饮食大国,叶广芩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当然对“吃”是很讲究的,北京人对饮食的讲究是很独特的。《状元媒》里提到了老北京的街上有很多美食,比如酸豆汁、切糕和炸饅饅是最受欢迎的名小吃,酸豆汁最具独创性,当属其中的佼佼者。叶广芩写的《豆汁记》,题目借用了京剧的曲目《豆汁记》,写了北京名小吃的历史文化,体现出了北京精神和文化传承。《豆汁记》里的小格格,在寒冷的冬天睡在温暖的床上。这里的床指的就是热炕,笼火、做饭、睡觉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吃着大锅里的饭菜,暖暖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体现了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情。

张爱玲生活在繁华的上海,如果说老式弄堂代表了传统的居住方式的话,那么洋房公寓则代表了现代的居住方式,这里的居住习俗成为其作品中重要的素材。上海的弄堂是一种当地特有的民用居住样式,在上海都市民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弄堂逐渐被上海人所接收,成为小市民阶层的主要居住方式。洋房公寓则不同,是外来的民俗居住样式,当时能买得起洋房的上海人是凤毛麟角,所以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张爱玲通过对弄堂和洋房的比较性描写,展示了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差异,塑造出了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如《多少恨》中对夏公馆的弄堂房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那地方虽也是弄堂房子,却是半隔离的小洋房,光致致的立体式……”^[6]张爱玲对男主角住所的描述,充分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地位差异,也为下文二人的分离埋下伏笔。

叶广芩的家族小说是依着家族自身的历史事实、家族记载或传说来进行文学想象的,她将理想中的女性性格设定为勇敢、独立,小说表达了对历

史文化爱恨交加的情感。张爱玲的家族小说表达了一种审美的情感化的人的历史，她更多的是关注女性生活的细节，突出历史文化中人的恶劣本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家族小说创作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作家创作所承受的历史压力。叶广岑依然像前辈作家那样，担当着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在人物与事件的整体动态关系中反省民族的历史，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东西”^[7]，这使现代许多家族小说削弱了历史文学艺术把握方式的想像力、体验性和趣味性，让史的价值

值侵占了诗的价值。然而，杰出的家族小说所以能比历史著作更有认知价值和动人之处，就因为它能向人们展现一种非史学的眼光、一种审美的情感化的人的历史。这样，家族小说作为一种更富于想像力和个体体验性的叙事方式，便占据了世界文学的显赫位置，也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独特分支。张爱玲的家族小说则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一种非历史的眼光、一种审美的情感化的人的历史。叶广岑和张爱玲把生命的感悟融入历史与文化的叙事中，体现出苍凉而沉重的叙事风格，表现出了有良知的作家的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 [1] 林丹娅.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271.
- [2] 张爱玲. 张爱玲小说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47.
- [3] 张爱玲. 张爱玲全集 [M]//创世纪.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62.
- [4] 叶广岑. 采桑子 [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4.
- [5] 王桂妹. 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色戒意识”与张爱玲的逆向书写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 [6] 张爱玲. 张爱玲全集 [M]//多少恨.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243.
- [7] 摩尔根. 古代社会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71：853.

（责任编辑：孙希国）

Ye Guangqin's and Zhang Ailing's Family Novels: a Comparison

DAI Na - x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er,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1, China)

Abstract: As female writers, Ye Guangqin and Zhang Ailing are good at observing the society and perceiving life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In their works, there is more or less the trace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and stress to convey women's spiritual demands. The unique female language in the works also demonstrates a distinctive color.

Key words: woman; family novel; Ye Guangqin; Zhang Ailing; comparative study